

《知新報》的翻譯及其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

羅 天 張美芳

[摘要] 《知新報》是晚清維新派於1897—1901年在澳門發行的報紙，利用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主要刊載《時務報》和其他內地報紙不敢刊載的消息和評論，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該報三分之二的內容為譯文，考察其創建、維新派翻譯強國思想之間的淵源、該報的翻譯贊助者和專業人員等，並梳理其對國際政治時事、西方先進科學發明、商務知識、思想文化的譯介，可知《知新報》憑藉翻譯活動，開啟了民智，推動了科學文化的啟蒙，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起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 《知新報》 翻譯 啟蒙 維新派 近代化 澳門

《知新報》是一份旨在宣傳變法思想、開啓民智的報紙，報社地址在澳門大井頭4號，是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喉舌，1899年轉為保皇會的宣傳機關。該報創刊於1897年2月，到1901年1月停刊，歷時四年，共出版134冊，^①是與上海《時務報》、天津《國聞報》齊名的三大名報之一。《知新報》所涵蓋的大量時事報導、先進的變法思想、深刻的政治剖析以及豐富的西學知識，使其成為研究維新變法時期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獻。

筆者將宏觀考察《知新報》翻譯活動的社會背景、意識形態和文化語境，闡釋《知新報》翻譯活動與晚清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之間的關聯，釐清維新派翻譯思想與《知新報》翻譯活動之間的淵源；研究《知新報》的翻譯專業人士、贊助者對於翻譯活動的影響，追溯譯文的接收和影響，並揭示《知新報》的翻譯活動在中國西學東漸以及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羅天，重慶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澳門大學人文學院翻譯學博士候選人；張美芳，澳門大學人文學院翻譯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翻譯學博士。

* 本文是澳門大學研究項目“翻譯研究的功能途徑：理論與實踐”（編號：MYRG2015-00234-FAH）及2016年中國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跨學科視角的抗戰時期軍事翻譯研究”（編號：16YJA740025）的階段性成果。

① 《知新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2078頁。

一、維新派的翻譯強國思想

中日甲午戰爭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衰敗根源在於其封建的社會體制、閉關鎖國的政策、君貴民賤的思想以及禁錮民眾思想的愚民手段等等。因此，以維新派為代表的許多仁人志士，特別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認為，要國家強盛，必需變法；要變法，必需效仿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學習西方教育、科學、文化等知識。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西學的群眾基礎薄弱，舉一國之才智而學西文、讀西籍，費時費力，恐怕有所不能待。楊深秀指出，“今日變法甚急，朝不慮夕，豈能從容待十年乎？臣以為言學堂不言譯書，每不能收變法之效”。^①康有為認為：“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學，莫若譯成中文之書，俾中國百萬學人，人人能解，成才自眾，然後可給國家之用。”^②因此，大量翻譯西書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捷徑。

早在1885年，因受到中法戰爭的刺激，康有為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建議開設譯書局，翻譯西書。1895年8月，康有為又與文廷式、陳熾等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又稱“譯書局”），將《萬國公報》改為《中外紀聞》，並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但不久，《中外紀聞》因為對朝政改革的議論過猛，受到保守派的彈劾，康有為等人只好把譯書的範圍縮小至關於國計民生、時政問題方面。

1895年10月，康有為於上海成立了強學會分會，主要譯印圖書和譯介國外新聞。《上海強學會章程》寫道：“道莫患於塞，莫善於通，互市者通商以濟有無，互譯者通士以廣學問。嘗考講求西學之法，以譯書為第一義。”章程中說明了強學會要追求中國自強而治學的“最要者四事”：譯印圖書、刊佈報紙、開大書藏、開博物院。其中，譯印圖書與刊佈報紙列為前兩位。首先，“今此會先辦譯書，首譯各國各報，以為日報取資，次譯章程條教律例條約公法目錄招牌等書，然後及地圖暨各種學術之書，隨譯隨刊，並登日報，或分地，或分類，或編表，分之為散報，合之為宏編，以資講求，而廣聞見，並設譯學堂專任此事”。其次，“今之刊報，專錄中國時務，兼譯外洋新聞，凡於學術治術有關切要者，巨細畢登，會中事務附焉”。^③

1896年，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寫道：“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強，以多讀西書為功。”^④1897年，《時務報》連載了梁啟超在維新運動中撰寫的一組政論文章《變法通議》。梁啟超專闢一章《論譯書》，他明確地提出：“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昭昭然也！”^⑤至此，維新派翻譯強國的思想基本形成。

在《論譯書》中，梁啟超闡述了翻譯的三個“要義”：“故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譯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譯之例；三曰，養能譯之人。”^⑥在翻譯選材方面，當以盡譯西方

①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片》，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46頁。

② [清]康有為：《上海強學會章程》，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3—96頁。

③ [清]康有為：《上海強學會章程》，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3—96頁。

④ [清]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飲冰室合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22頁。

⑤ [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0頁。

⑥ [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1頁。

法律、歷史、政治、農學、礦學、自然科學等書。在翻譯原則方面，強調人名、地名的統一，例如音譯“以京語為主，以天下所通行”；^①官制方面，“有義可譯則譯義，義不可譯乃譯音”；^②名物方面，“必以造新字為第一義”。關於翻譯人才，梁啟超認為，“凡譯書者，於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專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為上才”。^③

維新派不僅認識到翻譯對於強國的重要作用，還親自實踐，組織翻譯活動。梁啟超撰寫和翻譯了近百篇文章，從歷史、地理到政治名人等各方面，廣泛譯介西方的學術思想，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譽為“輿論界驕子，天縱之天豪”。在維新派的宣導下，全國各地也相繼出現了大批譯書機構，如譯書公會、大同譯書局、東亞譯書局、新民譯書局等，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翻譯高潮。

二、《知新報》的翻譯贊助者與專業人士

維新派的翻譯強國思想是《知新報》能夠誕生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影響該報辦報宗旨、辦報策略以及大力譯介西方知識的主要因素。從贊助者、籌辦者康有為和梁啟超對《知新報》的影響，以及該報撰述、翻譯團隊的組成等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點。

創辦《知新報》的想法來源於康有為。1896年11月，康有為在澳門與當地名仕交流宣傳變法維新的思想主張，期間提出在澳門創辦一份完全由維新派控制的報刊，以便與上海維新派報刊《時務報》形成南北呼應之勢。康有為經過深思熟慮，選址澳門，乃為澳門當時為葡萄牙殖民地，不受清朝控制，內地地方官員難以干涉，便於暢所欲言。康有為在澳門辦報的想法，得到當地巨賈何廷光的支持。^④

何廷光通過招股集資籌措辦報經費，很快便從澳門紳商中募得股金萬元。康有為離開澳門後，由其弟康廣仁與何廷光等具體籌備辦報諸事。1896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梁啟超來到澳門，協商辦報事宜。^⑤首先是商定了報紙的名稱。最初報紙擬稱《廣時務報》，後經梁啟超反覆斟酌，取名《知新報》，有開通民智，啟發讀者認識新事物、接受新觀點之意，其英文名為 *The Reformer China*，意為“中國改革家”，昭示着其首要目的在於宣傳及推動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維新改革。其次，梁啟超與澳門辦報諸人確定了《知新報》的主要特色：“一、多譯格致各書各報以續《格致匯編》。二、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為《時務報》所不敢言者。三、報末附譯本年之列國歲計政要。”^⑥前面兩點基本上確定了《知新報》與《時務報》不同的風格，實際上形成了對《時務報》的補充，更為重要的是定下了《知新報》倚重譯介的辦報方略。

① [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6頁。

② [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6頁。

③ [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9頁。

④ 侯傑、馮志陽：《梁啟超、〈知新報〉與澳門》，《文化雜誌》（澳門）2007年總第62期，第33頁。

⑤ 侯傑、馮志陽：《梁啟超、〈知新報〉與澳門》，《文化雜誌》（澳門）2007年總第62期，第35頁。

⑥ [清]梁啟超：《致汪康年》，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46頁。

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在澳門大井頭4號創刊出版。何廷光、康廣仁任經理，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吳恒煒、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八人列名撰述。八名撰述中，除吳恒煒外，其餘皆為康門弟子。此外，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弟子麥孟華、歐榘甲、黎祖健、孔昭焱等不時為《知新報》撰稿或翻譯。梁啟超竭力支持《知新報》，據不完全統計，梁啟超先後在《知新報》上發表了18篇署名文章。尤為重要的是，梁啟超在創刊號親自撰述《知新報敘例》，指出《知新報》的內容分為五欄：“論說”、“上諭”、“國內近事”、“譯錄西國政事”、“譯錄西國農學、礦政、商務、工藝、格致等報”。^①後面兩欄均為譯錄，體現了維新派翻譯強國思想對《知新報》的影響。

可以說，維新派人士特別是作為籌劃和發起人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對於《知新報》的辦報宗旨、辦報理念以及辦報策略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該報停刊。維新派人士的深遠影響還表現在：《知新報》十分重視翻譯工作，並擁有一個總體來說實力較強的翻譯班子。根據第1冊《本館總理撰述翻譯名列》，可知在初創時期，周靈生任英文翻譯，葡萄牙人宋次生任葡文翻譯，德國人沙士任德文翻譯，羅渣任法文翻譯，甘若雲任美國英語翻譯，唐振超任日文翻譯。根據《本館告白》（第20、13冊），該報創刊三個月，增聘“學於美京大書院十餘年，熟諳格致之學”的盧昌任英文翻譯，改聘日人山本正義任日文翻譯。不久，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參加《知新報》的日文翻譯工作。《知新報》陣容鼎盛時期，撰述和翻譯達到14人之多。其較強的翻譯力量，使《知新報》能從眾多外國報刊中較為準確而及時地譯出相關消息，推介給讀者。梁啟超對此高度評價：“《知新報》之翻譯……恒足敷四、五期之用而有餘，臨時不患窘竭，何其盛也，弟觀其所譯，未嘗有分毫讓《時務》，且時或過之。”^②

三、《知新報》對西政、西藝的譯介與對國民的啓蒙

除宣傳維新變法外，《知新報》把翻譯西政、西藝作為其重要的任務，反映了全面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願望。撰述人吳恒煒在創刊號《知新報緣起》中明確地提出要：“譯環球之近事，異聞必錄，不襲陳言；利病備陳，無取深諱。倡提聖學，無昧本原；采譯新書，旁搜雜事；審其技藝，窮其新理，則明者勢不抱曲學而愈愚矣。察其土俗，知其形勢，則通者勢不泥舊章而解蔽矣。明其律法，諸其機權，強者勢不執成法而振弱矣。”^③

梁啟超則在《知新報》第17冊所轉發的《西政叢書敘》中指出介紹西政知識的原因：當時，他所看到的“西文譯華之書數百種，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僅有的新譯政書“未必其彼中之良也”；就算所用原著優良，“譯者未必能無失其意也”；就算二者兼具，也是“西域十餘年以前之舊籍，他人所吐棄而不復道者”。^④因此，翻譯西政書籍是刻不容緩的。同時，《知新報》通

① [清]梁啟超：《知新報敘例》，《知新報》1897年第1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3—4頁。

② [清]梁啟超：《致汪康年》，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56頁。

③ [清]吳恒煒：《知新報緣起》，《知新報》1897年第3期，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2—3頁。

④ [清]梁啟超：《知新報緣起》，《知新報》1897年第17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3頁。

過刊載的奏摺指出翻譯西藝之書的重要性：“今則聲光電化製造工藝諸書，翻譯刊行，汗牛充棟，可知得一新理，即能成一新說，創一新術，即可製一新器。”^①在西政與西藝的譯介比例方面，梁啟超提出“略依《格致匯編》之例，專譯泰西農學、礦學、工藝、格致等報，而以政事之報輔之，約言藝者六，言政者四”，以繼《西國近事》和《格致匯編》，以補《時務報》“所譯西報詳於政而略於藝”的不足。^②

《知新報》不惜篇幅地譯介西政和西藝，把最新最先進的西方科技文化知識介紹到中國，據筆者對其中132冊（即第1—115、117—133冊）的統計，當中“譯”字出現了一千多次，除了少量用於次級欄目（如“時論輯譯”），介紹譯者（如“周逢源譯述”）和譯文出處（如“譯倫敦頗路麼路官報”）之外，其他大部分出現在文章內部，以推廣譯書譯報的思想。同時，《知新報》中“新”字共出現六千多次，其中含有“新”字的標題就多達一百餘個，如“暹羅新政”、“比國新政”、“燃燈新法”、“輪船新式”、“新式水底戰艦”、“電音新制”等等。可見，《知新報》因譯立報，以新興報。

（一）《知新報》對西方先進科技知識的譯介

《知新報》極為重視對西方科技知識的譯介。所設“農事”、“工事”、“礦事”、“格致”等欄目，貫穿第1—133冊，主要介紹西方各國的科技知識發現、技術發明創造和科學事業發展。每一期的篇幅中，科技知識的譯文約佔三分之一以上，譯自美、英、法、葡、日等國家與香港地區的二三十種報刊。《知新報》譯介的科技知識內容也較為豐富，涉及農牧漁、物理光學、化學化工、機械製造、材料科學、天文地質、地球測量、軍事、汽船艦艇、冶金紡織、醫療衛生、探礦採礦、無線電、能源利用、科技教育等領域。

《知新報》共51冊載有“農事”欄目，譯介內容事關農業生產的方方面面。首先，譯介了多種農作物的境外種植方法，如草莓（第3冊）、棉花（第58冊）、歐美馬鈴薯（第41冊）、無花果（第42冊）、意大利橄欖樹（第56冊）等。其次，對一些農業技術也有所推介，如肥料的使用（第3、4、5、41冊）、病蟲害的防治（第3、39冊）、養雞新法（第25冊）、奶牛飼養（第40冊）等。對於美國作物栽培學著作《樹藝求精》，則由周靈生譯述加以連載，長達44冊。此外，《知新報》還涉及農產品加工，如蘿蔔製糖（第79冊）和砂糖生產機械的推廣（第120冊）。尤為難得的是，一些國外農業教育、管理、經營方式也得到了翻譯介紹，如法國廣設農學堂（第49冊）、俄國的農政新議（第49冊）、意大利農學（第58冊）和日人論保護小農之法（第66冊）。這些農學知識對於當時中國的農業生產和農民啟蒙教育不無裨益。

《知新報》有110多冊設有“工事”欄目，介紹海外先進的工業生產，其主要內容包括工業物質、交通工具、電器產品等。工業物質主要涉及鐵絲的工業應用（第27冊）、鋼鐵生產新工藝（第50冊）、鋁製品的生產（第55冊）、銅的提純工藝（第65、80冊）和電鍍工藝（第47冊）、白鐵的製造（從第43—46冊連載）等等。《知新報》譯介的交通工具涵蓋了火車、輪船和飛機。對火車的譯介可謂不遺餘力：不僅介紹了鐵路的修建（第1、23、24、26、54冊）、鐵軌生產（第19冊）、新式火車（第80冊）、英美火車之間的比較（第103冊），甚至還介紹

① 《總署遵旨議覆並議經濟特科章程摺》，《知新報》1897年第17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5頁。

② [清]梁啟超：《廣時務報公啟》，《時務報》1896年第15冊封4。

了世界各國民眾搭乘火車的頻率（第100冊）以及修建西伯利亞鐵路所能帶來的利益（第100冊）。輪船也是頗受關注的交通工具，相關話題有汽船省煤（第107冊）、輪船日新月異（第104冊）、美國創造輪船者軼事（第110冊）、新式輪船甚至水底戰艦（第59冊）等。對於尚未產生實際應用價值的飛機，《知新報》表現出極大興趣，一直保持關注（第6、31、92、110冊等）。對電力和電器產品，《知新報》也頗有遠見地進行了宣傳，如電車（第5冊）、水力發電（第16冊）、電燈（第25冊）、電話（第25、61冊）以及無線電通訊（第109冊）等。其他在“工事”欄目得以介紹的還有彩色照相術（第8、31冊）、瑞士鐘錶的製造和暢銷（第11冊）、天文望遠鏡（第3冊）、德國紡織工業（第36冊）、氣球（第83、84冊）等等。難能可貴的是，《知新報》極為重視專利思想的譯介。《給照勸業》（第40、41冊）討論了專利保護以及鼓勵創業，指出“故設丕但之例，亦鼓勵製物之人，但限以專利之年，期滿，人可效而制之”。^①隨後在第66冊又介紹了美國專利保護和激勵創造的效果，第77冊列舉了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等申請專利的數量，第102冊介紹了日本人從專利所獲得的經濟收益。

“格致”專欄在118冊《知新報》中均有設立，所含科技知識豐富多彩，大多集中在物理、化學和醫藥衛生等領域。對清末的中國民眾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科學知識的盛宴。例如，《考求照骨》（第2冊）和《叉光顯微》（第38冊）等譯文介紹了X光的獲取和應用；《壓氣行車》（從11冊開始連載）介紹了蒸汽機的工作原理和特點；《化學新理撮要》（第32冊）介紹了氧氣的液化和蒸發等現象；《西士談天》（第32冊）是關於西方學者對隕石、北極光、太陽黑子的研究；《考論腦質》（第21冊）探討人類與動物之間腦容量的不同；《微蟲致病》和《去水毒法》（第36冊）解釋了微生物治病的原理，告誡人們“設法殺滅居處間之微生物，或阻止其發出之地，此誠衛生之要旨也”，^②並指出消除水中微生物的方法。《知新報》的許多科技譯文還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問題，例如飲酒有礙腸胃消化（第3冊）、鹽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種用途（第37冊）、如何保護鐵器不生銹（第38冊）、飲食衛生和科學（第39冊）、空氣污染治病的原因和防治（第39冊）、氧氣與人體健康（第40、41冊）、飲用水品質（第50冊）、牛奶的實用價值（第66冊）、心臟對於人體健康的重要性（第66冊）、接種牛痘防疫（第74冊）等等。

《知新報》對西方科技知識的譯介形式多樣。大部分科技譯文為摘譯和編譯，取自西方的新聞報導。當然也有全譯，並以連載的形式刊登。如介紹天文學知識的《西士談天》經過4次連載，《礦務演說》連載5次，《壓氣行車》連載8次，採礦學領域的《考礦備要》共連載了19冊。此外，《知新報》譯文通俗易懂，並常常配有實物圖像或操作流程圖，使其直觀明瞭，便於理解和傳播。

當然，《新報》在翻譯時難免存在缺陷。例如，有些科技名詞的翻譯不夠嚴謹，沒有附上中英文對照表（《時務報》的體例）。如《考究動物身內肥裔》（第59冊）介紹科學家對動物內脂肪形成的研究，其中的科技名詞“普律天”（protein）、“紀李角踐”（glycerine）採用音譯，雖有注釋，仍然令人費解。

^① 《給照勸業》，《知新報》1897年第40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7—18頁。此處，“丕但”為英文“patent”的音譯，也譯為專利。

^② 《微蟲致病》，《知新報》1897年第36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0—11頁。

（二）《知新報》對國外商務知識的譯介

《知新報》中開設“商事”專欄的有112冊，大量翻譯介紹歐美商業行情，對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經濟情況譯介分析。例如，《伊藤論中國財政》（第78冊）介紹了日本伊藤博文對中國財政狀況的認識和評價。又如，譯文《美人減稅》指出“英屬加拿大遣頭等使臣二員往美京華盛頓籌商善法，使兩國商務愈增，交情愈密”；^①譯自倫敦商務報的《重稅與謗》（第15冊）介紹了美國重稅產生的根源以及對於重稅的批評；《請改美稅》（第36冊）則關係到法國要求美國降低關稅的事宜；來自《倫敦礦務報》的譯文《產金總數》（第15冊）介紹了全球去年生產黃金的總量；譯自《又新日報》的一則短消息《布業獨盛》（第16冊）介紹日本和歌山地區前一年各式日本絨的產量；譯自《紐約喜羅報》（*New York Herald*）的《銀行偽票》（第16冊）報導英國銀行銀票被人偽造一事。與農事和工事欄目相似，“商事”專欄也有關於商務教育的內容，如《英人論增設商務學堂》（第95冊）呼籲英國增開商務學校，加強商務人才的培養。此外，《丁酉列國歲計政要》（第24—42冊連載）雖然未列入“商事”一欄，但它系統譯介了西方年度財政收支報表，希望西方現代會計制度能給清朝政府財政提供借鑑。

當然，這種對國外商務知識的介紹，與《知新報》對國內商務發展的期待是一脈相承的。例如，編者多處介紹香港工商業發展的經驗，如選登《香港紳商演說商務匯述》（第79、80冊）。此外，《知新報》還專門撰文論證在中國設商會、開公司、與國際接軌的必要性。可以看出，《知新報》譯撰結合，意欲推動中國商業的近代化進程。這些國外商務知識的譯介，一方面本着強國富民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增強了讀者對於近代商業知識的瞭解。

（三）《知新報》對國際女權運動的譯介

《知新報》對西政的譯介內容也較為廣泛，包括政治、軍事、外交、民生狀況、女權運動、對外侵略擴張等等內容。在第1—46冊中，譯介西政的內容主要分佈在“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俄國”以及“各國”等專欄。從第47—111冊開始，介紹西政的專欄改為“亞洲近事”、“歐洲近事”、“美洲近事”、“非洲近事”和“澳洲近事”。從第112冊開始，西政內容主要分佈在“中外交涉新聞”、“外洋外埠新聞”、“各國新聞”三個專欄中，所佔篇幅比例也有所減少。筆者在此以《知新報》對女權運動及列國在中國侵略擴張等情況的譯介為例。

婦女解放運動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興辦女學、宣傳婦女解放思想是清末維新派的重要舉措之一。相應地，《知新報》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支持婦女解放。首先，譯介外國女權運動的進展狀況，婦女界發生的大事要聞，宣傳婦女解放。例如，譯文《女準自主》（第22冊）指出，“婦女有權，國家設例，任其自主”，^②但同時也介紹美國各州對女權的不同實施情況。又如，《貧女學堂》（第24冊）報導了美國紐約集資修建女學堂，請女教師教授當地貧困婦女以女紅烹飪之事；《婦人鳴冤》（第24冊）介紹了法國婦女通過法律幫助提出離婚，維護自身權益的案例；《法國婦女學為律師》（第97冊）和《法議院准婦女充為律師》（第97冊）則介紹了法國法庭特委員和下議院准許婦女學律者，發誓而上公堂充當律師；《倫頓萬國婦女公會開

^① 《美人減稅》，《知新報》1897年第13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03頁。

^② 《女準自主》，《知新報》1897年第22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1—12頁。

議》(第97冊)報導了世界婦女大會召開以爭取權益的新聞；^①《英婦女欲得議院權》(第98冊)則表明歐洲婦女開始爭取參與國家事務的選舉權和決策權。這些新聞傳達了西方婦女在獲得婚姻自主的權利之後，開始爭取平等的工作教育權利、經濟婚姻的自由獨立以及政治權利。《知新報》譯介的西方女權運動最新動態，向國內尚在抗拒纏足陋習的婦女打開了一扇瞭解世界女權運動的窗口，有助於喚起她們的覺醒。

《知新報》不僅宣傳女權運動，還積極實踐女權思想，在翻譯工作中聘請女性參加。例如，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就在該報創辦早期擔任日文翻譯並參與撰述，成為譯介日本新政措施的主力軍。到1897年9月底已卓有成效，該報特地在《本館告白》(第32冊)中登報表揚，表明對女性勞動的尊重：“近刊之日本報大半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譯，揭之於此以免掠美。”《知新報》第43冊也明確指出，康同薇開始完全接替原日文翻譯山本正義的工作。據統計，在《知新報》工作期間，康同薇翻譯了大量文章，原文來自於幾種有代表性的日文報紙：《內閣官報》、《東京日日新聞》、《長崎新報》、《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時審新聞報》、《東京時事西文報》、《時事新報》、《太陽報》、《新聞報》等。^②

(四)《知新報》對國際形勢的譯介與國內弊政的揭露

《知新報》大量譯介世界時事、大國的內政外交、各國的對華政策以及中外交涉情況。譯文主要來自英、美、日、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強國的大報、名報，計約八十餘種，基本涵蓋重要的國際新聞，如英國《倫敦每日電音報》(*The Daily Telegraph*)、美國《華盛頓報》(*The Washington Post*)、法國《巴黎新聞報》(*La Presse*)、日本《九州日報》。此外，還有來自香港、澳門的報紙，如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孖罌報(*Daily Press*)等。

《知新報》利用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常刊載一些《時務報》和其他內地報紙不敢刊載的消息和評論，以揭露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1897年底，德國以山東教案為藉口，派兵強佔並強租中國膠州灣。對這一重大事件，《知新報》除了報導國內反響外，還編譯整理了同期世界報載的相關資料，先後在該報第41—48冊作出連續報導和評論，發表中外文章19篇，其中譯文15篇。^③例如，譯自香港《士蔑報》(*The Hongkong Telegraph*)的《論據膠台》揭露了德國侵略中國的野心：“德人蓄志在中國邊岸，取一駐兵屯商之所，外人揣知久矣。”^④同冊譯自香港《士蔑報》的《覆議膠事》一文，明確指出：“故分割中國之情愈迫矣！然不須待德人佔據膠州，又不須聞及德奧意聯盟之消息，始知中國有瓜分之勢也！”^⑤此外，俄國強租旅順和大連、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佔九龍等列國瓜分中國的狂潮在《知新報》都有新聞譯介、綜述評論等多有反映。

《知新報》有時利用對外文報刊文章的翻譯，來批評當時中國官場的弊政，揭露內地官吏貪污受賄種種醜惡行爲。如《論中國度支積弊》譯自倫敦《頗路麼路報》(*Pall Mall Gazette*)，

① 報紙此處譯文將 London 稱為“倫頓”，即為今天所謂“倫敦”。

② 王天根：《清末民初報刊與革命輿論的媒介建構》，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③ 鄒秀英：《〈知新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

④ 《論據膠台》，《知新報》1897年第41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2—13頁。

⑤ 《覆議膠事》，《知新報》1897年第41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3頁。

揭露了中國行省十一總督屬下無數代朝廷徵收賦稅的小員“凡與其事者，必得染指，必圖中飽，故能實解到戶部者，只二三成而已”。^①

又如《檀虐華工》披露了美國檀香山的中國工人受到的虐待，^②客觀上激發了中國讀者的民族認同。此外，其他國家間的內政外交及軍事衝突，在《知新報》也有所反映，如美西戰爭、菲律賓民族獨立運動等。這表明《知新報》一方面開始以全球視野來觀察和反映世界大事，另一方面幫助中國讀者開啓民智，開拓眼界，培養近代國民意識。

四、《知新報》翻譯的接受與影響

《知新報》發刊不久，便因其鮮明的特色，發行全國，並遠銷美國、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國，深受各國有識之士的歡迎。它在國內北京、太原、開封、西安、成都、貴陽、南昌等四十多個城市，設立五十多個派報處；國外有舊金山、海防、東京、橫濱、神戶、新加坡等七處派發，地域廣泛，影響深遠。

首先，《知新報》的西學譯介對一些地方官員和上層知識分子產生了非凡的影響。直隸、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蘇、山西、廣西、貴州諸省，或由官府札飭所屬，或由書院院長勸諭諸生購閱《知新報》。廣西洋務總局在通飭中說：“現在泰西各國，報館如林，英吉利一國，多至二千餘館，中國亦漸通行。茲有廣東澳門開設知新報館，其敘例著於篇首，所錄各國近事，皆照各國文本譯出，至詳且備，亟應隨時閱看，以廣見聞。……其論說明正，深通時變，尤能激勵憤恥，博深切明。其所譯西國政事，以及農、商、化、電等學，足見泰西富強之本，而非同剿龍訛傳，豈可廢而不閱。”^③

其次，《知新報》的譯介在不少名流當中也深有影響。例如，鄭孝胥1897年4月23日的日記中曾寫道：“《知新報》言余辭參贊，兼及梁卓如，以為難能。”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說：“是時廣州香港各報只記載瑣碎新聞及轉錄滬報消息，絕不知新學為何物。嗣丁酉上海《時務報》、澳門《知新報》相繼出版，競言新學，香港各報稍稍和之，廣州報紙始敢略談時事……”^④

再次，《知新報》的譯文還成為當時其他報紙，如《利濟學堂報》、《湘報》、《湘學新報》、《集成報》等轉載科技知識的來源。《利濟學堂報》第7冊“藝事裨乘”的七篇科技文章當中，有五篇科技類論文錄自《知新報》。^⑤

《知新報》既建立了人數眾多的讀者群，也吸引了大批的投稿者。其稿源地遍及沿海地區和部分內陸城市，擴及美國、日本、新加坡、老撾等地。稿件中還有當時各地學校、學會等各類公

① 《論中國度支積弊》，《知新報》1898年第58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4頁。

② 《檀虐華工》，《知新報》1897年第20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21頁。

③ 廣西洋務局：《廣西洋務局奉史中丞飭全省閱〈知新報〉札》，《知新報》1897年第15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4頁。

④ 鄒秀英：《〈知新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第77頁。

⑤ 董貴成：《〈知新報〉對科學技術的宣傳》，《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青島）2004年第4期，第26頁。

眾團體的成立章程。^①這也證明了《知新報》譯介策略的成功所帶來的廣泛影響。

結語

《知新報》誕生於清末維新派的變法活動中，其譯介活動萌生於維新派的翻譯強國思想。而這種翻譯為“強國第一義”的理念深深地植根於《知新報》的辦刊策略，極大地影響了《知新報》翻譯專業人士的選任和報紙欄目的設置。應該說，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贊助者對於《知新報》的翻譯活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知新報》在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的同時，大量譯介最新的西政內容和最先進的西藝知識。其對西方大國內政外交時事的譯介，以及借助翻譯對國內弊端的批斥，有助晚清讀者認清當時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國際形勢，培養近代國民應有的國際視野，客觀上有助於對封建社會的反思及否定。而對女權運動的譯介與推動，則有助於男女平等的思想代替男尊女卑的陋習，促進人們的思想解放。西藝方面，《知新報》不惜篇幅所譯介的當時最新奇最先進的西方科學知識，給封閉落後的國人帶來了前所未聞的驚喜，開擴了視野。正如陳志勇所言，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譯介改造了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推動了新學科的建立。^②《知新報》所譯介的商務知識衝擊了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有利於官辦、民辦商業的發展，推動了近代工業的萌芽、民族資本主義的誕生、以及生產力的提高。

通過翻譯這一手段，《知新報》廣泛宣傳西方新聞時事、科技知識、經濟商務和思想文化，在客觀上開啓民智，對國民進行了教育科學文化的啓蒙，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遷。《知新報》的實踐和成功，揭示了翻譯在中國近代化進程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鄒秀英：《〈知新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第74—77頁。

② 陳志勇：《譯書與中國近代化》，《南京政治學院學報》（南京）2002年第2期，第70頁。